

中國的「睡」與「醒」：

不對等的概念化與應付手段之研究（一）^{*}

魯道夫 G. 瓦格納 著^{**}

吳 億 偉 譯^{***}

摘 要

藉由與概念交流，語言不斷地豐富自己與其他語言的內在意含。雖然這並非現代的新現象，但十九、二十世紀間更為密集迅捷的交流，已大規模同質化了世界現代語言。這個同質化是以現代秩序與等級概念為核心的。因為這些全球化概念的共同特質隱藏在不同語言的表層之下，對它們的存在大部分的說話者並無認識。概念的抽象性使其無法在適當的時空中直接引領行動，為達此目的，必須求助於隱喻和明喻，這些隱喻和明喻因而成為視覺再現的素材，就如在政治漫畫

^{*} 本文原以英文發表於2011年的《跨文化研究》(Transcultural Studies) 電子學刊，今經作者本人同意授權本刊後翻譯為中文，分三期連載刊登。原作請參見：Rudolf G. Wagner, “China ‘Asleep’ and ‘Awakening’: A Study in Conceptualizing Asymmetry and Coping with It,” Transcultural Studies, no.1 (2011): 4-139. 網址：

<https://archiv.ub.uni-heidelberg.de/ojs/index.php/transcultural/issue/view/1077>.

^{**} 作者現任德國海德堡大學中國研究教授暨「全球脈絡下的亞洲與歐洲」菁英研究群偕同主持人。

^{***} 譯者現為德國海德堡大學漢學系暨歐亞跨文化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中所見。

本文將針對隱喻的徙動與其跨越語言文化的視覺表達形式進行研究，並聚焦在「中國的沉睡／中國的覺醒」此隱喻之上。此隱喻在十九世紀成爲國際通曉的說法之後，至今仍是全球性隱喻典庫的一部分。本文將探討這個隱喻在這極度不對等的跨語言和跨文化交流中的互動，與其相關的文化中介者，並涉及文化交流互動的接觸地帶。

關鍵詞：隱喻、不對等、跨文化、漫畫、政治、語言學

China “Asleep” and “Awakening”:

A Study in Conceptualizing Asymmetry and Coping with It

Written by Rudolf G. Wagner

Translated by Wu I-wei

Abstract

Languages continually enrich themselves and other languages with concepts they exchange. While not a modern phenomenon, denser and faster communication during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has resulted in a large-scale homogenization of the newly-emerged national languages around a core of globalized concepts with a modern order and hierarchy. The common features of these concepts are hidden below the linguistic surface of the respective languages, with most speakers being generally unaware of their existence. As concepts are abstract and therefore unable to guide action in time and space directly, recourse is generally taken to metaphor and simile. These in turn lend themselves to visual representations such as political cartoons.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migration of such metaphors and their visualized forms 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It will focus on the metaphor of “China asleep/China awakened,” which became common

parlance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has remained in the global metaphorical canon to this day. The article addresses the dynamics of this highly asymmetrical translingual and transcultural migration, the cultural brokers involved, as well as the contact zones where the exchanges take place.

Keywords: metaphors, asymmetry, transcultural, cartoons, politics, linguistics

中國的「睡」與「醒」：

不對等的概念化與應付手段之研究（一）*

魯道夫 G. 瓦格納 著

吳億偉 譯

一、簡介：概念、辭彙、隱喻與圖像

基本的政治概念如「國家」、「國族」、「國民」是高度複雜的。要想獲得一個清楚不變的理解有其困難；更遑論想從這些概念中推斷出在某特定時間地點所應採取的行動。大部分的概念擁有此特性，而這

* Christoph Harbsmeier 提供了很多寶貴的建議使這篇論文更為完善與清楚。Andrea Hacker 在編輯上給予了重要的協助。Mareike Ohlberg 承攬了釐清文中圖片版權問題之重任。金觀濤與劉青峰教授協助筆者使用「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研究開發，劉青峰主編）。該數據庫目前正由政治大學與香港中文大學共同繼續研發完善，檢索服務由政治大學「中國近現代思想及文學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計畫辦公室提供，謹致謝意。同時許多同事也給筆者提供了寶貴的參考資料，Prof. Dietmar Peil 提供了歐洲政治思想中對於沉睡這個隱喻的使用相關參考資料；Prof. Thomas Maissen 關於「沉睡瑞士」的參考資料；Prof. Elisabeth Sinn 個人擁有的〈時局圖〉明信片；Prof. Patrice Higonnet 沉睡的 *Tiers État* 之參考資料；Prof. Paul Geyer 關於佩脫拉克（Petrarch）提供的參考資料；Prof. Anthony Parel 一份與甘地有關的資料。這樣的研究其實一開始就應該是集體工作，各界協助是無可或缺的，為此，筆者致上深深謝意。

些概念是世界共有重鑄近代語言的一部分，也因此建構了我們對世界的認知。它們缺乏具體性的原因在於，是這些概念組構了經驗，而非由經驗組構了概念。它們有各種隨時間而變動的表現形式，正如同那些為描繪核心概念所付出的努力般。因此，這些概念是討論的主題和探索的對象，而不是提供簡潔、可被普遍接受的定義。

這樣的基本概念可用許多方式表達。以「國家」(state)一詞為例，它可有以下形式：

- (一) 文字，如 state、nation、government、dynasty、polis、court；或以中文為例，國、邦、朝。這些抽象詞本身往往是被遺忘了的隱喻。例如 Government (政府) 緣自於拉丁文 *gubernare* 和希臘文 *κυβερνεῖν* (kybernein)，兩者皆意指「掌舵」。¹
- (二) 隱喻或複雜的動態明喻，如身體、船艦、舞臺、島嶼、房屋、農場。
- (三) 寓意類，如寓意人物或是動物（龍、鷹、獅、瑪麗安娜 (Marianne)^{*1}、約翰牛 (John Bull)^{*2}）。
- (四) 寓言故事，如曼德維爾 (Bernard Mandeville, 1670-1733)

¹ 以中國而論，隱喻的屬性深藏在文化的內部，已失去了明顯的外徵。以字音為基礎的中國文字研究，目前還未進展到足以做出任何確切定論。傳統的中文語源學 (etymology) 主要以書寫文字作為字源來進行研究，然而這應屬於一種表示文字含意的研究。鑑於呈現抽象概念如「國」(state)、「家」(family) 的困難，以上的研究方法對此貢獻不大。「國」是一個被「口」和「或」所組成的文字。「口」可被解讀為封閉的領域或是被牆圍住的首都；在「口」裡的「或」字是「國」字聲符，引領讀者讀出“guo”音，同時也帶有「也許」、「或者」和「些許」的意涵。以語源學的方式解讀「國」字，可以理解十九世紀中太平天國的紀錄為何拒絕書寫這形式的「國」字。他們寫「国」，用君主的「王」替代了不確定的「或」字，藉此強調他們對自我王朝永恆不滅的期待。中國共產黨已將國字的簡繁兩種書寫方式，收入現代中文書寫標準之中。

^{*1} Marianne 是法蘭西共和國的國家象徵，亦代表著自由與理性的價值觀。其銅像遍滿法國重要機構與廣場。

^{*2} John Bull 意指典型的英國人。

^{*3} Fable of the Bees 是西方思想史上著名的曼德維爾悖論，其核心論點指出：私人惡德即是公共利益。

的蜂之寓言（“Fable of the Bees”）^{*3}。

它也可能由以下的方式表示：

- （一）以圖像為媒介。因「文字」不易轉化為圖像，所以圖像大多從明／暗喻與寓意的儲藏庫裡採擷原料——並轉而豐富其內容。代表這類圖像的例如政治漫畫、寓意描繪和以圖像來再現結構（以「房屋」為類比）。
- （二）藉由靜態的結構，如國家組織與其應盡的責任、執法機構或建築群，如我們所知道的華盛頓國家廣場（Washington National Mall）與新德里（New Delhi）。
- （三）藉由同樣靜態的運用並試探國家權力的實踐行為。這行為可能被權利機構視為合法或非法，也可能成為長期習慣而被行政官員與人民正當化。逃稅屬前例；規定接受預防接種和學校教育，屬後例。
- （四）透過一首曲子或一場棋賽與其內部環節之間無形的互動。交響樂的形式早已被此種方式解讀，而古代中國對於「正」樂與「淫」樂的區分，其中所蘊含政治隱喻的看法，也是類似的例證。

這些概念，是浩瀚跨文化和跨語言流動與交流的一部分。在這過程中，文化不斷地組成和轉化自己，這裡包括以上提到的各個層面，即概念、辭彙、隱喻與圖像。文化的改寫過程，需要將概念、辭彙、隱喻與圖像轉化為智性工具的實體部分，使其適用於社群，其過程各有不同。在辭彙的層面，新詞語（neologism）必須被建構，這自然會使舊概念及語言素材存在著緊張關係；²在隱喻的層面，新環境對隱喻形成的實際環境是不熟悉的，因此需要解釋使隱喻變得有意義。一旦這些用以討論議題的不同媒介跨越了語言與文化的邊界，那原本

² 即使再次使用久已不用的舊詞來表達新舶來辭彙，如“revolution”之於中文的「革命」，就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些詞實屬新辭彙，因為舊有的內容已被翻譯新字的意涵給替代了。

或多或少協調的同質（homogenous）關係就會變得相當混亂。

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研究大多固著在對單一語言的辭彙研究（或是被認為單一「同質」文化環境，如歐洲或東亞），對於隱喻、明喻或圖像等其他媒介則規避不談。隱喻的研究則專注其語言與哲學方面的特性或是它們的使用史之上，³對其所屬的思想與概念史，只稍加提及。⁴

躋身於重要歷史基本術語的開創者之林，布魯孟伯格（Hans Blumenberg, 1920-1996）十分注意隱喻在概念史裡所佔的決定性角色。⁵他起初宣稱，古希臘時期，理性（*λογος*, *logos*）和宇宙（*Kosmos*）之間沒有什麼深刻的裂隙（*chasm*），並認為理性能超脫歷史、語言、文化的多樣與變化而生的無常，來完全描繪宇宙的結構與進展。⁶所以，至少就這樣的希臘觀點看來，前述一系列豐富的文字化、視覺化、建構上或是實行上的表達（*articulation*）只是徘徊在確切核心的邊緣。布魯孟伯格視「隱喻學之於概念史，為一種附屬關係（*subservience*）」。⁷

³ 參見 Hedwig Konrad, *Étude sur la Métaphore* (Paris: Librairie Philosophique J. Vrin, 1958); Max Black, *Models and Metaphors.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2); George Lakoff and Mark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⁴ 然而，這類研究有一些不錯的成果。Alexander Demandt, *Metaphern für Geschichte. Sprachbilder und Gleichnisse im historisch-politischen Denken* (Munich: Beck, 1978); and Dietmar Peil, *Untersuchungen zur Staats- und Herrschaftsmetaphorik in literarischen Zeugnissen von der Antike bis zur Gegenwart* (Munich: Fink, 1983). Peil 提供了一份說明其所研究的明喻之圖像附錄。筆者自己的研究：運動（*movement*）作為一種社會行動形式的概念之全球化，但未在這詞的隱喻方面作更細節的探究。Rudolf G. Wagner, “The Canonization of May Fourth,” in *The Appropri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China’s May Fourth Project*, ed. Milena Doleželová-Velingerová (Cambridge: Harvard East Asia Center, 2002), 66-122.

⁵ Otto Brunner, Werner Conze, and Reinhart Koselleck, eds.,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 (Stuttgart: E. Klett, 1972-1997).

⁶ Hans Blumenberg, *Paradigmen zu einer Metaphorologie* (Frankfurt: Suhrkamp Publishers, 1998), 8. 這本書由2010年康乃爾（Cornell）大學出版了英文版本。

⁷ Hans Blumenberg, “Das Verhältnis der Metaphorologie zur Begriffsgeschichte

然而，已知的證據並不支持這樣的說法。柏拉圖《理想國》第六卷中，當蘇格拉底試圖說服對話者，一個國家（polis）絕對需要一位可勝任此職的領導者之時，他表示自己要論證此點「只有藉由寓言的幫助」。他繼續談到若是一艘船上的每個人都宣稱自己有資格駕駛並爭奪控制權，那船必定逃不過翻覆的命運。一艘船只能有一位勝任的領航員。這裡蘇格拉底是在隱喻一位哲學家之王；只有在其指導下才能確保船的安全抵岸。⁸蘇格拉底強調，在創造一個使複雜結構可懂並有實際結論可推的環境之時，隱喻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在此之後，還有許多證據可充分指出柏拉圖與其同代之人，直至當代歐洲作家，都進一步使用了這個隱喻。⁹

幾年之後，進一步的研究使布魯孟伯格改變了對隱喻功能的看法。現在他描述隱喻是「一種抓握聯結的獨立方法」（*eine authentische Leistungsart der Erfassung von Zusammenhängen*）。¹⁰然而，即使如此擴大定義仍顯不足。概念，眾所周知，在針對某一個特定時間地點所必須採取的實際步驟之上，無具體性可言。雖然柏拉圖的蘇格拉底所描述的情形牽涉了如國家、權威、社會秩序、勞動分工、危機和更多的概念，這個已發展成完整明喻的隱喻，提供了平行的動力，換句話說此隱喻連結了一套特定時空下的概念，並指示且合理化行動的特殊進程。隱喻與具體行動的聯繫，使得隱喻不僅擁有「抓握聯結」的功

(im engeren terminologischen Sinne) als ein solches der Dienstbarkeit,” *Paradigmen zu einer Metaphorologie*, 11.

⁸ Plato, *Republic*, trans. Benjamin Jowet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71), 233.

⁹ 見 C. W. Mendell, “Horace I. 1,” *Classical Philology* 33, no. 2 (April 1938): 147. Blumenberg 曾引用 *Horace I. 14* 提及「國之船」一段，認為其為國／船隱喻的起源。但這樣的解讀現在已被認為不可信。關於歐洲的國／船的隱喻，請見 Helmut Quaritsch, “Das Schiff als Gleichnis,” in *Recht über See. Festschrift Rolf Stödter zum 70. Geburtstag*, ed. Hans Peter Ipsen and Karl-Hartmann Necker (Hamburg: R. v. Decker’s Verlag, 1997), 250-286.

¹⁰ Hans Blumenberg, “Ausblick auf eine Theorie der Unbegreiflichkeit,” in *Schiffbruch mit Zuschauer. Paradigma einer Daseinsmetapher* (Frankfurt: Suhrkamp, 1979), 87.

能，而且進一步以同樣獨立的方式由概念轉換為行動。

因此，我們可以較為精確地闡述我們的問題：隱喻、明喻和圖像不只解釋已有的概念，但由於在採用它們時對實效的考慮遠遠超出純粹的抽象分析所佔的地位，使它們得以可能以歷史經驗這一關鍵環節，進入這些概念，並成為其內部結構的一部分。倘若如此，它們的作用就不僅僅只限於闡述某一題材而對此議題無其他效力；它們是，或可能是，討論這些概念的首要的並高度具體化的素材，從而成為其討論的重要成份。這些隱喻的討論將會適當地影響到概念的理論定義，使得概念在極大的程度上只是努力表達出時空之外的抽象術語，而那些在很久以前便在自身範圍內的隱喻、明喻與圖像，卻探索著具體的術語與行動所隱含的路徑。

嘗試給各概念列出一張明確定義的「清白身世表」的夢想還沒有消退，而且仍不斷激發一代又一代的哲學家 and 政治學者為其獻身努力。然而，即使是他們也無法忽略那些抽象之外的具體表達方式。許多故事已經闡釋了：人類沒有能力為那些複雜的結構和包含著具體行為的過程下一個簡潔且可信的定義。一個基督教故事說到，上帝創造了世界，並且獨自理解所有事情運作的方式。然而，祂給人類足夠的智力去領會自然規則，使其在不可預知的環境中獲得基本的安全感；祂也給人類充分的表達方式，使其探觸部分的關鍵樣貌。中國傳統故事也提到，三皇五帝是廣袤過去偉大且罕見的「事件」。他們天生就能完全理解整個宇宙與社會，推斷某特定時刻必須要執行的步驟，使宇宙中——國家和社會——變動的部分，能和宇宙的整體秩序維持同一節奏。這種天性無法為他人所繼承，但他們留下紀錄讓後來的統治者在治理國家與處理個人事務時，至少有個指南可參考。這些紀錄被認為足以顯現聖人們充分意識到確切言語中藏有的缺陷。他們的遺產——也就是中國的「經傳」，使用了各類非抽象的表達方式，從單調的紀錄（《春秋》）到詩歌（《詩經》）；從預言手冊（《周易》）到政府組織程序（《周禮》），甚至「擊鼓與跳舞」也提供給後代可實施的行

動綱領（《樂經》）。這些故事的共通元素即是，使用具體的表達形式來探究複雜且動態的結構及其運作過程乃為至關重要。

同時，語言中的隱喻和圖像中的隱喻一樣，都是不規則的。隱喻對於人們不斷企圖建構一個同質世界的心理，是一種挑戰，因為隱喻陳述一些相關且真實的事情，但實情卻非如此。國家並非一艘船，一國之統治者也不是什麼舵手。首次讀到這種說法的讀者，需要經過「解碼」才能理解。隨著這些隱喻、明喻與圖像的普遍使用與廣為人知，這種初次的訝異便慢慢消失，成為所謂——德國在討論報紙語言與圖像所用的辭彙：「集體共有的象徵符號」（*Kollektivsymbole*）。這是一個被廣泛接受的文字與圖像表達形式的文庫，作家與插畫家可從中擷取所需，如同使用一般文字和圖像時可能產生的聯想。¹¹ 一旦這些隱喻跨越了語言、文化、甚至是歷史的邊界，¹² 整個過程將重新啟動一次。若新環境的讀者不熟悉隱喻對某真實世界中事物的引用與其例證過程，或者根本沒覺察到它們是種隱喻（例如，在前現代的中國以一艘漂流外海的船隻作為明喻，或者中古歐洲則是以織入進口的中國絲綢上的象徵為喻），那麼這文本和圖像依舊是無法被理解的。因此，隱喻或圖像是非常需要文本來進行解釋和「翻譯」的。在隱喻的奇特入侵之後，文本藉由清楚聯結圖像、隱喻與其所體現的深淺不一的抽象概念，使心智得以再次協統世界；在這過程中，心智獲得了可觀的豐富見識與資訊。¹³

¹¹ 關於這個概念參見 Jürgen Link, *Die Struktur des Symbols in der Sprache des Journalismus. Zum Verhältnis literarischer und pragmatischer Symbole* (Munich: Fink, 1978).

¹² 在中國古代的政治討論中，並沒有使用國家如船這樣的隱喻。首次出現是在二十世紀初期，可參見劉鶚：《老殘遊記》（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第1章。同一時間，即使在歐洲，船作為隱喻很早便凍結在時空之中僵化了，並未現代化。它永遠是古希臘的海船，運輸著地中海附近的人與貨物。在它身邊咆哮的暴風雨，威脅它的岩石、上帝與怪獸，都突顯了為了生存，船上的每個人都必須要遵守船長命令，即使他不是聖人。

¹³ 見 Hans Blumenberg, "Ausblick auf eine Theorie der Unbegrifflichkeit," in *Schiffbruch mit Zuschauer*, 87-91. 自散逸或被遺忘的材料中援引圖像典故或

此文的目的並非企圖對「國家」等概念提出絕對的定義。反之，我們研究的是世界各國為領悟此「物」之結構和動力——倘若我們可以如此稱之——所盡的努力。這裡指發展種種策略以求操作、改變與廢除它。文章的焦點在種種處理這「物」的歷史具體實踐上。為此我們不能忽視除文字語言外，其它表達傳遞概念的形式，特別不能不輕視或避免那些被人們視為簡易且附庸大眾教育的方式。我們需要轉而檢驗這些證據，去審視不同表達形式間的互動，和它們對彼此以及對所表達之概念的整體理解所產生的影響。

本論文所選擇的個案研究皆符合下列標準：

- (一) 所討論的概念在不同的層面均有表述，這裡指辭彙、隱喻和圖像。
- (二) 因涉及主題的材料數量與範圍相對而言有限，因而研究與立論可以比較簡捷有效。
- (三) 事件的環境，被當事者視為緊迫到足以使持有不同觀點的參與者，在各種媒介平臺上一同進行討論。

顯然，沒有任何基礎來宣稱所檢驗的個案具有典型性。因此，這裡提出的所有結論都只是假設，還需進一步驗證。

二、主動權（agency）與權力不對等（asymmetry of power）之隱喻與圖像：時局（全）圖 （“The Situation in the Far East”）

1899年7月19日，一幅名為〈時局全圖〉，英文名為“The Situation in the Far East”的政治漫畫，出現在香港。（圖一）就政治漫

是隱喻的英國歷史漫畫及中國文本，突顯了「過去即異國」這個事實，因而有解釋文本的需要。以 Gillray 為例，其在十九世紀初所發表的漫畫，對當代讀者甚至英國人也都是不好懂的。為消弭歷史鴻溝，現今學者參考發行自 1879 年德國威瑪時期期刊倫敦與巴黎中的德文解說，因其發表時間與漫畫原來出版的時間相近。

畫而言，它點出了一個迫切的政治議題；就描寫中國與列強關係的漫畫而言，它涉及了一個列強與中國為中心論者皆認同的急迫議題。這漫畫，聚焦在中國與列強間權力與主動權不對等的現狀上，使我們得以在一個非常具體的範圍內探討並深究觀念、隱喻和圖像之間在這論爭中的理論關係。這論爭至今仍形塑著中國的政治想像。



圖一：謝續泰（Tse Tsan-tai, 1872-1937）：〈時局全圖〉
 (“The Situation in the Far East”)，（香港：不著出版地，1899年7月）。

這張漫畫，以熊、鬥牛犬、青蛙、老鷹等動物象徵列強諸國，各自控制部分中國的領土。圖上端的中文解釋是關鍵，它幫助觀者辨認哪個動物代表哪個國家。圖下端的文字，則描述了列強各自的目標與策略。這些文字解釋表示，至少有部分預期的讀者，仍需要通過說明來理解這張圖。

〈時局全圖〉中，每隻動物身上，都印有英文文本陳述各自意圖，圖底則有中文總結。¹⁴ 從這些陳述中，可看出列強在中國政策上的互動情形：俄國大熊爲了征服北方滿州、蒙古、朝鮮而出動，除了想要掌握一定勢力範圍或是取得殖民地，還要藉霸道與羞辱的統治方式擴張領土。英國約翰牛（John Bull）坐擁富庶的揚子江流域——英國主要的影響領域，因受惠於「門戶開放」政策，從中國獲得了同等商業權利，同時爲防止其他國家建立殖民地，希望維持「中國領土完整」。¹⁵ 這隻鬥牛犬威脅地注視青蛙所佔據的南方。¹⁶ 青蛙代表的是正苦於法紹達（Fashoda）併發症的法國，在一處同名的蘇丹小鎮被英國所「染疾」。在那兒，英國嘗試建立從開普敦（Cape Town）到開羅（Cairo）的南北軸線與法國爲持續控制非洲而建立的東西軸線起了衝突，最後，法國被迫放棄此願。在中國，法國爲擴張殖民地，伸出臂膀，直趨中國南方與海南島。美國於1898年結束與西班牙的戰爭之後，這隻老鷹大翅一張，菲律賓成爲牠的保護地，也顯露出對中國的強烈興趣。老鷹頸上寫著一句格言：「血濃於水」（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這引自美國海軍上將塔特諾爾（Josiah Tattnall）的名言，1859年，他打破美國的中立立場，在二次鴉片戰爭協助英

¹⁴ 這裡的文字並不好辨認，我能解讀的部分如下：「俄妥罷篡恥，英保同（？）通商，法志拓已屬，美念親助英，日助英拒霸，德（？）量大欲」。

¹⁵ 這政策是由英國明確提出，爲抗抵俄德兩國在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慘敗之後，對中國提出的權利要求。等到〈時局圖〉印出，英國已因獲得香港島對面的九龍地區九十九年的租約和威海衛海港，而部分放棄這立場。

¹⁶ 這也許能追溯到一般英文中對法國人的揶揄表達、包括法國料理中的青蛙腿，或是兩者均包括。

國運輸物資。因此，這說明美國在中國的政策上，將與英國站同一邊。日本，如同美國，以其官方象徵顯示，這裡被形象化為太陽，日光含蓋了南方的臺灣，更繼續延伸到中國本土福建，同時，在北方對準了中國先前的朝貢國朝鮮。太陽之下的標語「約翰牛和我將看守這熊」，意味著與英國的聯盟關係，和排斥俄國的特定立場。最後，德國化身為一隻小蛇，環繞山東半島。¹⁷

動物的大小，反應了權力的強弱。這圖繪出了兩年來的政治發展，俄、法、德、日（甚至英國，雖然這裡並未顯示），在中國土地上，獲得了長期租約與其他特權，儘管英國反對俄、法、德等國公然

¹⁷ 當前學術界，關於晚清動物形象的研究已有一些文章出版。費茲傑羅（John Fitzgerald）在 *Awakening China* 中對「甦醒」與「獅子」兩種意象中所包含的象徵意義進行分析；此研究是建立在他更早的文章之上，見 John Fitzgerald, “‘Lands of the East Awake!’ Christian Motifs in Early Chinese Nationalism”, 收於黃克武、張哲嘉編：《公與私：近代中國個體與群體之重建》（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年），頁362-410。John Fitzgerald 在此文處理了甦醒與獅子兩種意象，並回溯「甦醒」這隱喻的起源。這篇文章詳述西方國家，包括澳洲，對於曾紀澤文章（見下文）的接受與其後的討論，並查究這些被討論的隱喻在基督教的源頭為何。非常感謝黑克（A. Hacker）博士提醒我一個來源，來自於《新約聖經·聖保羅致羅馬信徒書》：「再者，你們曉得現今就是該趁早睡醒的時候；因為我們得救，現今比初信的時候更近了。」（〈羅馬書13：11〉）。Sin Kiong Wong 和 Jeffrey N. Wasserstrom 一文聚焦在動物意象如何被用於揶揄誹謗的意圖，見氏著英文“Animal Imagery and Political Conflict in Modern China”，收於勞悅強、沈安德（James St. Andre）編：《漢學縱橫》（香港：香港商務印書館，2002年），頁233-275。單正平：〈近代思想文化語境中的醒獅形象〉，《南京大學學報》2006年第4期，頁29-36。他察考了「睡獅」這意象的使用，特別是1902年之後，並添述了中國人對獅子之聯想的變化轉型。稍後他在自己的專著《晚清民族主義與文學轉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頁113-147，出版了另一個更詳盡的版本。楊瑞松：〈睡獅將興？近代中國國族共同體論述中的「睡」與「獅」〉，《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0期（2008年11月），頁87-118，嘗試在中文討論情境中，解讀種種「沉睡中國」的意象。楊瑞松同樣使用了本文所採用的「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石川禎浩：〈晚清「睡獅」形象探源〉，《中山大學學報》2009年第5期，頁49、88-96，追溯睡獅的使用以及其與科學怪人佛蘭肯斯坦（Frankenstein）的聯想，討論的時間更早於單正平一文。

對中國進行殖民佔領。¹⁸

從中英文本之間的差別，可清楚看出預設讀者的不同。英文讀者已不需提示即可辨認動物與國家間的關係，中文讀者則需要。英文讀者預期能將動物身上的暗示訊息讀作各政府的政策，雖然這兩者的關係往往不那麼直接。若想解譯法國青蛙上的法紹達，或是美國老鷹甚至英國鬥牛犬身上的文字，前提則是要對英文報紙有較長時間的閱讀與熟悉程度才行。在中文的解譯裡，我們看到以上提到的典故訊息全然不見，表示中國讀者對此是不熟悉的。

¹⁸ 1900年出版的《Appleton 1900年年鑒》(*Appleton's Annual Cyclopaedia*)中關於中國的簡明、屬實的敘述文章，完全可以用來作〈時局圖〉的文本解讀與指南：「俄國在日本贏得維護滿洲的權利之後開始干涉相關事務。1897年，因擁有建設經滿洲抵直隸灣海港的西伯利亞鐵路分支之權利，俄國獲得九十九年大連港的使用租約，作為鐵路的終點站及旅順港的軍用碼頭。德國假借中國暴徒殺害兩位傳教士之名，1898年春天出兵佔領膠州灣，之後要求並成功取得膠州灣港和山東半島上商業政治的優惠國待遇，並宣稱此地為其勢力範圍。英國政府收回開放門戶政策，不再反對德俄等國建立勢力範圍，以俄國得手旅順港的相同條件，獲取了直隸海港威海衛的租約；同時，又獲中國政府承諾揚子江流域諸省領土不會讓渡給其他國家，無論是以前租約、抵押或其他指認方式。法國政府身為羅馬天主教傳教士的保護者和積極活躍的重要軍事力量，比起其他國家，雖然商業交易規模較小，但在早期和中國就有較多的外交來往。由於黑旗軍參與安南叛亂，法國也曾與中國發生過戰爭。現在，法國同樣也順利地得到九十九年可使用中國本土位於海南島對面的海港為租約地，用來補充船輪所需的燃煤；已獲得的海南島的領土不讓渡之保證，又擴張到與〔越南的〕東京相壤的中國廣西省。英國堅稱自己在廣東廣西及揚子江流域的河南的權利，不願交讓西江流域和緬甸與〔越南的〕東京鄰界領土的貿易優惠權給法國。他要求補償，條件是擴張香港租界至對面的九龍，再者還要中國確定，正如承諾法國的，絕不讓渡兩廣領土給他國。日本自1895年甲午戰爭勝利後，由於列強干涉只得滿足於以臺灣為殖民地，現在也得到承諾：臺灣島對面的中國省份（福建）不再讓渡給其他國家；不過，日本未曾索討這省份的優惠經濟利益權利。義大利在租約上要求一座燃料補充港，雖然英國正式支持，但還是受到了輕蔑拒絕。十八個中國省份中，已有十三個被歐洲各國標記為勢力範圍，而且不可數計的礦產、鐵路和商業租界也納入外人手中。通商口岸的數目漸增至三十二，但有些位於內地，從未有機會接觸到任何歐洲人。」*Appleton's Annual Cyclopaedia and Register of Important Event of the Year 1900* (New York: D. Appleton and Co. 1901), 90.

圖中央，中國是一片死寂的領土，一個對列強種種圖謀毫無反應的物體。相對而言，俄、法、英、美、日等國各有其「國家主動權」，使之能猶如一體，齊心一志行動。中國只是一個空白空間，淪為列強慾望的對象，而缺乏「國家主動權」來捍衛自己的主權。在對中國的表現中，沒有賦予其一個有意志的生命體。這圖像在視覺和象徵上所反映出的主動權的不對等，是「中國」繪圖者謝纘泰（1872-1937）對時局的認識。他的觀點是，所有關於中國的主動權全部屬於外國強權，而非「中國」。就這點而言，這幅漫畫準確地反映出中國輿論界包括當時的政治改革家的共識。當時《亞洲評論季刊》（*Asiatic Quarterly Review*）的編輯布爾傑（Demetrius Boulger，1853-1928）相當同情中國的處境，針對這主動權的不對等，以另一個隱喻對此作了總結。1897年，他發表了一篇綱領性文章，名為〈東亞病夫〉（*The Sick Man of the Far East*）。他寫到：

這樣說其實一點也不為過，中國給人的一般印象不僅微不足道（*quantité négligeable*），¹⁹且還必須得聽從他人旨意，因而放棄為自己命運奮鬥的權力。倘若中國不從如此嚴重的現況中覺醒，無庸置疑，這預見將成為定論。²⁰

回到〈時局全圖〉上，我們可在左上角找到一首沒有英文翻譯，單純寫給中文讀者的中文詩。如果〈時局全圖〉的圖像與文字是用來解釋遠東現狀，那麼這首詩則是針對認同「我們中國」的讀者，告知圖像的主旨：

沉沉酣睡我中華，那知愛國即愛家，

國民知醒宜今醒，²¹莫待土分裂似瓜。

¹⁹ 此說法是當時法國首相費利（Jules F. Ferry）多次被引用的一句話。

²⁰ Demetrius Boulger, "The Sick Man of the far East," *The New Century Review* 10 (1897): 258.

²¹ 這裡的「國民」，有助於解釋布倫其利（Bluntschli）所用的德文 "*Staatsvolk*"

這首詩用了一系列混合的抽象概念，如「國民」、「國」、「家」與「中華」，以及不同的隱喻，如「沉睡」與「瓜分」等。圖像與文本進行互動。這詩並非要對中國與列強在主動權與權力關係上做一個客觀評估，實際是要激起反響，號召行動。它把圖像中描述的情景譯成：中國似瓜，正被列強切分；然而更重要的是，它把圖像中對中國當時所缺乏的主動權與「有機的」國家認同描繪翻譯成：「我中華」正在「沉沉酣睡」，為防止在睡夢中被人瓜分，「國民」現在必須醒來，以同樣深刻的愛家之心，來愛自己的國家。詩暗示中國人民實該對自己缺乏愛國心感到羞恥，因其後果即是在圖像中，中國沒有一個代表其國家的形象。簡言之，在如此關鍵時刻，這張漫畫藉由描述國家在主動權上的明顯不對等，來羞辱「我們中國」，為使其成爲一個真正的國家。²²

「醒」與「睡」這兩個概念，在佛教與基督教中都有特殊意含。康有爲和梁啟超等晚清改革者與在南京領導近代佛教復興運動的楊文會，有密切關係。²³ 他們形容社會改革者所使用的辭彙，部分採自菩薩獻身「拯救蒼生」的描述。此外，他們也和一些基督教傳教士有密切來往，如決定專注於改革中國政體而非宗教皈依的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和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等人。然而，佛教與基督教用來喚醒教民所使用的辭彙，與那些用來描述中國沉睡與甦醒的全然不同。

這圖，如任何陳述方式可有的功能，透露了一些政治上的妥協跡

一詞。在英文中，即被翻成“nation”。

²² 中國國族主義的推動，是通過調動激發民族羞恥感而非主動自發地爲國家奉獻。柯文（Paul A. Cohen）首先在他對王韜的研究上提出了這個看法。Paul A. Cohen, “Wang T’ao and Incipient Chinese Nationalism,”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6, no.4(1967): 559-574. Kathryn Edgerton-Tarpley 接著對這看法做了進一步的發展，見 Kathryn Edgerton-Tarpley, *Tears from Iron: Cultural Responses to Famine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8).

²³ Gabriele Goldfuss, *Vers un Bouddhisme du XXe siècle: Yang Wenhui (1837-1911), réformateur laïque et imprimeur* (Paris: De Boccard, 2001).

象。出版當時，英國為取得長期租約，正與其他國家競爭；同年稍晚，它終於屈服於美國的壓力，回到以往的立場上，然而仍未放棄任何租約。為什麼遺漏此事並且強調英國在「中國領土完整」上的承諾態度？也許是因為謝纘泰是殖民政府公僕，遂以這種方式回應香港特殊的政治狀況。同樣地，對日本的描述也有所保留。日本不是動物。當時日本堅持他國不能將福建（位於日本新領土臺灣的對面）納入勢力範圍一事，也沒被描繪。潛在的原因，也許是當時謝纘泰周圍的香港革命分子同日本領事有著密切的連繫；謝曾明確提過，當時日本領事館在支持革命分子的活動。²⁴

在繪者 1924 年出版的英語回憶錄中，他再次確認了這圖像的目的：「這圖是為喚醒中國，並警告人民這帝國正面臨被列強瓜分的危機。」換言之，它呼籲中國公民醒來，應對主動權之不對等與因而產生的權力上之不對等。繪圖的對象即是那些稱中國為「我們中國」的人。²⁵ 這張圖的雙語特色與中英兩種文本的差別，需要更進一步的探討。

廣義來說，圖像與隱喻的研究是觀念史的一部分，所以，儘管因媒介性質不同而有所調整，但主要特色仍需符合那些為研究觀念與文字所建立起來的要求。在隱喻與明喻的層次上，隱喻的邏輯、實際使用的質量維度、功能以及與觀念及圖像之間的關係需被探究。在圖像的層次上，也適用相同標準。由於歷史研究（以及大量的以文本為主的數據庫的長期發展）對文本的注重且無意中包括了隱喻與明喻，而大大助益了這些領域的研究。對於圖像的情況則是不同的。如果我們想證明，這圖像果真在建構對遠東現狀的認知，以及在鼓勵「未來」的愛國分子採取行動上起了影響，那麼，單單指出〈時局全圖〉是面

²⁴ 謝纘泰云：「我們經由日本領事館獲得日本政府的秘密支持。」見謝纘泰：“The Chinese Republic: Secret History of the Revolution”，《南華早報》（1924年），頁9。

²⁵ 謝纘泰：“The Chinese Republic: Secret History of the Revolution”，頁15。

向大眾的公開的印刷品，隨手可得，是不夠的。基於考證出版印刷數量，遞送的模式，以及當時人們對漫畫的反應的困難，我們必須得善於利用四散的證據。幸運的是，相對而言我們仍有相對豐富的紀錄；不幸的是，史料文獻的收集與基本數據的審定成爲這篇論文的責任，也是本文篇幅超出一般限度的原因。

謝纘泰聲稱，他的漫畫曾出現在許多外國的畫報中。²⁶ 雖然我還未能找到這些畫報，但有鑑於他的回憶錄中大部分的訊息都被證實，基本上他的陳述有極高的可信度。謝纘泰寫道：「允許楊衢雲在日本出版一份滑稽『歪曲』模仿我的漫畫的彩色版本，結果造成我被香港殖民地司（Colonial Secretary）質疑。」²⁷ 確實，一張被大幅度更改過的彩色謝纘泰之圖，現還存在（圖二），²⁸ 從其繪畫方法和政治傾向，讓我們聯想到，也許這張圖就是他提及的日本版本。1940年，地理歷史學者朱士嘉，在進行與中國地圖相關研究之時，在美國國家檔案館找到一份這圖的彩色版。比較原圖，其圖配了用廣東話書寫的詳盡解說。²⁹ 此圖，後來除去原廣東話書寫的文字部分，出現在中華人民

²⁶ 謝纘泰：“The Chinese Republic: Secret History of the Revolution”，頁15。
楊衢雲（1861-1901）與謝纘泰1890年在香港一同從事建立反滿清政府的一個地下革命組織。這組織後與孫中山的革命組織興中會結合，他成爲了第一任領導者。

²⁷ 謝纘泰：“The Chinese Republic: Secret History of the Revolution”，頁15。

²⁸ 這圖可在許多網站上搜尋而得；來源於Wikipedia中文名字網站拷貝：
<http://zh.wikipedia.org/zh-tw/File:%E6%97%B6%E5%B1%80%E5%9B%BE.jpg>，檢索時間：2011年3月31日。

²⁹ 〈時局圖〉和佚名的〈時局圖題詞〉，《近代史資料》1954年第1期，頁6-12。此資料中的廣東方言文有白話註解，助於非廣東讀者閱讀。王云虹在〈有關〈時局圖〉的幾個問題〉一文中，融合《近代史資料》的注釋與原文本，把全文轉譯成白話文，參見王云虹：〈有關〈時局圖〉的幾個問題〉，《歷史教學》2005年第9期，頁74，注釋1。在一封日期標爲2010年10月26日的信件中，美國國家檔案館特殊媒體檔案的製圖部門的巴騰（D. Bottoms）寫到：「這張指定的地圖在單位的收藏中已無法被辨認。」尋得一份品質較好的印製品，將有易於解讀底線的文字說明，以及追溯出版處是日本還是香港的疑問。謝纘泰曾在他1899年的記錄中提到日本版本，或許可推測出版日期正是或是接近這一年。

共和國無數的教科書中，用以說明帝國主義者對中國的邪惡企圖。



圖二：〈時局圖〉，出版年為1899 或是1900 年，也許出版於日本。

這版本承襲了原來黑白版本的圖像佈局、象徵以及動物形象上的標語，但是更強調並依賴視覺呈現，正如圖像兩旁的對句明確表達的：「不言而喻，一目了然。」³⁰之喻，在白話文可譯為隱喻，顯示圖像與隱喻間密切的關係。此圖以廣東話書寫的解說取代了第一個版本中的中文圖說。³¹同時，每個動物身上都加了國旗，以助觀者辨別。英國鬥牛犬成了橫躺的獅子，但尾巴卻寫著德國。其緣由只能從廣東話解說中得知：為抵禦德國在山東獲得的強悍地位，英國獲得了威海衛港租界權。這解說，細談被列強納入影響範圍的中國領土。

這張圖對俄國的斥責特別激烈。如若俄國的計畫成功了，那麼中國北部包括滿州、蒙古、朝鮮都將在其鐵拳的統治之下。「佢見著人就亂屠、村就亂燬，當你地唐人性命賤過沙坭！」³²圖中表現的權利關係根據列強當時對中國的威脅而有所變動，首先是俄國，然後是法國、英國和日本。法國一直與俄國進行交涉，英國則忙於防止法國在中國南方建立勢力，日本太陽兀自將光照延伸至圖中休憩的中國人身上。這解說譴責日本一邊大言不慚說著中國與日本同文同種，應要相互扶持，一邊卻緊抓臺灣不放。德國只是英國不足道的替角。圖像下方諷刺地顯示其他次要的外國勢力：戴高帽的小癩蛤蟆，從左邊匆匆加入人群，也企圖分享「戰利品」。不過，他們充其量只是旁觀者，站在圍牆外。例如，義大利已準備舉旗出價，卻還是被擋在界線之外（為此他派遣了一艘巡航艦以示其威力，無濟於事，仍遭到拒絕）。奧

³⁰ 這段話合併了兩句成語。前一句可回溯到《孟子·盡心上》第21則，通常用來形容君子以一種方式體現高尚道德，不需言語，因為身體、氣質與行為已傳達了一切。後一句則確定來自《朱子語類》，參見朱熹撰，黎靜德、佐藤仁編輯：《朱子語類》（京都：中文出版社，1984年），頁137。

³¹ 〈時局圖題詞〉，《近代史資料》1954年第1期，頁6-12。一份改寫的白話中文版本可以在王云虹：〈有關《時局圖》的幾個問題〉，《歷史教學》2005年第9期，頁74，注釋1一文中找到。

³² 某些評論者就這段落提出假設，這漫畫與短詩應出現在1900年到日俄戰爭之間。然而，早在1900年前日本已有反俄國的爭論，而1900年的政治發展（庚子拳亂與外力涉政）也未提及。如果這真是日本印刷品，在謝纘泰的年表裡，其將會被放在1899年。

地利站在他的右手邊，在思考要不要加入這場狩獵。

此圖雖刪去「我們中國正深深沉睡」這句話，卻將「沉睡的中國」以及其後果，在中國地圖上視覺化了。圖中最重要的形象，即是帶著「鹹氣」^{*4}的滿清官員，³³而且在解說中被描繪成「總係一角呢埋沒有的作為」，在圖中心「大睡長眠猶是未起」。³⁴他灑出的網，網住了左上角醉心追求文官武職的漢人，被無止盡的空洞八股文「迷住」，以及舊式軍武越練越「頑皮」，最終，都成貪腐官員。³⁵同時，日本的「太陽」之光也延伸到滿清官員上，暗示著日本的影響力在明顯增加。

不同讀者，從這張圖中，會讀出不同的「沉睡的中國」。儘管威脅來自列強，尤其是俄、法兩國，圖像卻顯示滿清官員在面對國族危機時，只是沉沉之睡；此外，還陷漢人於科舉制度中空耗心力，揮霍國家的財產，滿足私慾，腐敗，壓迫人民。中國不只是簡單地睡著了，它的政府對國家危機毫不關心。這圖並不企望動員沉睡的滿清，反倒指向那些被網住的中國人——不只是廣東人。解說結束時以此呼籲：「若係你地華人唔發奮重等到乜天時？」期待清廷或網內高官達人因感到羞恥而有所作為，顯然無望。唯一的族群可能因羞愧而奮起為國家「圖強」的只有「華人」。

與第一版不同的是，這版本針對的是那些對解讀這類新式漫畫缺少經驗的廣東讀者。他們對於「國民」、「國家」這些新式概念，或「瓜分」這樣的隱喻（兩者均用於前版本中，但這裡卻不被使用）還不熟

^{*4} 編注：此以廣東話「鹹氣」，意指圖中滿清政府腐敗的形象。

³³ 「唉！我好笑好嬾還有箇只蝦仔（筆者按：指滿清政府），……，看他大睡長眠猶是未起。」佚名：〈時局圖題詞〉，頁11。

³⁴ 這短詩以幾句逃避責任的遁詞來描述他，如蝦仔，在廣東話中意味初生之嬰孩。因反對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對清朝一直維持著——或許是策略性的——忠誠，謝纘泰和其同僚強烈並明確的反對滿清政府。

³⁵ 中文裡的虛字「之乎者也」，在這裡被用來象徵中國傳統教育的空洞。這四個字出現在這首短詩中，或許也出現於圖中網裡老人手中的書本。用這些虛字再加上老人的年紀，顯示出要花很久的時間才能理解基礎中國傳統古文。舊式的武器設備則為短詩所提到的弓刀大石，以及圖像所繪的戟、馬與大石（供提舉）。這接受軍事訓練的男人似乎也過了黃金年歲。

悉，然而他們有一定的中英文雙語能力。這兩幅圖顯現並暗示兩種不同的回應與預期的行動。第一個版本的圖像基本上重在提供傳遞給閱讀者中國當前局勢的訊息，其中特別強調俄國的威脅，期望國民一看到圖像便能馬上「醒來」面對事實。然而，醒來之後該做些什麼，並未特別說明；第二版，似乎引導閱讀者將所有怒火導向滿清政府。

第二張圖明顯地對日本與英國益加批判的立場。香港當局多半不是此圖預設讀者，但對這一點卻敏感地領悟到了。由於謝纘泰住在香港，又是〈時局全圖〉的草創者，香港政府對他進行了指責。這也許可以說明為什麼謝稱這張圖是一種「歪曲」。英國殖民地司（the British Colonial Secretary）的反應指出了英國（或許是日本）當局的臆測，擔憂這張圖或許會造成什麼潛在的影響。

第二版的圖像也以一些不同的形式存在。例如，它曾出現在彩色明信片上（圖三）。³⁶

這張彩色明信片少了四邊，也缺了印刷者資訊以及文字說明。1890年代開始，以描述當前要事（例如戰爭）的政治漫畫為圖的明信片，普及歐洲、美國、日本等地，³⁷大大助益了那些在知識分子之外，沒有閱讀報紙能力與習慣的族群，使他們很快地明瞭政治漫畫慣用的想像符碼。此明信片可說是同類型中針對中國讀者最早之一，甚至是第一張明信片。這意味著當時確實存在這樣的市場需求，與利用新媒介，以郵寄明信片給（在中國或是海外）親友的方式，來傳播特定訊息。

³⁶ 我只得到原版彩色明信片的黑白複製本。

³⁷ Sepp Linhart 曾出版一本西方關於日本的戰爭明信片選集，其中也涉及到中國。Sepp Linhart, "Niedliche Japaner" oder "Gelbe Gefahr"?, (Vienna: Lit Verlag, 2005).



圖三：〈時局圖〉明信片，1899 或是 1900 年。

1903年，為警告國人俄國的威脅，由蔡元培（1868-1940）在上海創辦的《俄事警聞》，可進一步讓我們看到此圖像散播的過程。此報在介紹〈時局圖〉第二版的改動版時稱：「這張圖叫做瓜分中國圖」。很明顯，這圖已廣為人知，而且在流傳中還添了個與原來中英文都不同的名稱。文章繼續說到，「前年有一個人從英國新聞紙譯出來的」。這裡所提的，應不是圖像，而是與文本相關的資訊。最後，報導又回到這點上：「翻譯這一張圖的人姓謝，是香港地方印的，五彩鮮明，上海別發洋行寄賣，各位可以買一張，拿回去給小孩子看，恐怕講到明白時，連七八歲的小孩子，也都要發起憤來，各位年紀這樣大了，請想想看。」³⁸ 很顯然的，蔡元培並不清楚這張圖——並非謝纘泰的版本——的來源，以及謝的全名。不過，他相當肯定這張來自香港的彩色版圖，目前正在上海發售；而且香港讀者相當熟悉這張圖。別發洋行（Kelly and Walsh）是當時上海的出版社和書局（成立於1876年），專門販賣英文與相關中國的中英雙語書籍。³⁹ 這裡的預設讀者，顯然相當熟識這家提供大量與中國相關西文書籍的書店。同時，對於只能在西方人經營的書店裡才能尋得這張極度充滿愛國意識的中文海報，也不覺訝異。

這幅原名為〈時局圖〉的政治漫畫，以〈瓜分中國圖〉之名散播至日本、上海與香港。流動的過程中，不同地方的不同讀者隨其所欲詮釋解讀，因此改動了圖像的內涵。

1900年的一份資料，讓我們窺見到觀者如何與圖像互動。詩人黃遵憲（1848-1905）在自己的兩首詩中提到這幅圖。他曾協助將日本明治維新的過程細節介紹給中國社會，⁴⁰ 但在1898年，卻因維新運

³⁸ 〈現勢〉，《俄事警聞》第1號（1903年12月），收於《中華民國史料叢刊》重印版A12（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83年），頁7-9。

³⁹ 別發洋行（Kelly and Walsh）的出版品被某公司整理成清單，至今在香港還找得到。可上此網頁：http://www.defyse.com/kelly_walsh_publications.htm，檢索日期：2010年10月20日。

⁴⁰ 黃遵憲：《日本國志》（羊城：富文齋刊本，1890年）。見 Kamichi Noriko, *Reform in China: Huang Tsun-Hsien and the Japanese Model* (Cambridge, MA:

動失敗，受到排擠，回到位於廣州東部的老家梅州。

第一首詩〈仰天〉（1900），蘊藏許多典故暗示。這詩以一雙憤怒的眼「仰天擊缶唱烏烏，拍遍闌干碎唾壺」開始，又以目空一切的氣勢，「篋藏名士株連籍，壁掛群雄豆剖圖」兩句結束。⁴¹有趣的是，「群雄」，就字面看來是正面的辭彙，感覺起來這詩傳達出來的怒氣，並未直接指向列強諸國。而詩中牆上圖畫，名為豆剖圖，與瓜分概念如出一轍。⁴²

同年，黃遵憲寫了另一首詩，再度提到這張掛在他牆上的畫。此詩名為〈病中紀夢述寄梁任父〉，始於黃某夜夢到梁啟超被清廷刺客所殺，提著自己的頭顱而來。兩位在1898年同樣被處決的改革倡言者的靈魂，到來導引梁啟超上天堂。在詩中提及孫逸仙與其有關的人們一段時，梁啟超扼要陳述了年輕的革命派對他保皇思想的批評。這首詩，最後止在黃遵憲驚見牆上梁啟超人像的那一刻：

君頭倚我壁，滿壁紅模糊。

起起拭眼看，噫吁瓜分圖。⁴³

這裡所提到的瓜分圖，也有著與上海販賣的瓜分圖相同的特徵。對作者而言，瓜分圖已成中國情勢的速記，而且確認預期讀者對這速記的內涵，無疑能領會。然而，在目前所獲得的資料中，我無法辨別這兩首詩是否曾經刊載在報紙還是雜誌上——這將公開地使黃遵憲與瓜分圖連繫在一起；不過，在梁啟超發表的作品中，我們可以找到第二首詩早期的出版紀錄。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1981).

⁴¹ 黃遵憲：〈仰天〉，收於黃遵憲編，錢仲聯箋注：《人境廬詩草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頁797。謝謝李漫的修正。

⁴² 這裡用的「瓜分」之詞來自「豆剖瓜分」或是「豆分瓜剖」。在這裡只使用了前半部。

⁴³ 黃遵憲：〈病中紀夢述寄梁任父〉，收於黃遵憲編，錢仲聯箋注：《人境廬詩草箋注》，頁1071。



圖四：〈時局圖〉，（水彩？），彩色手繪。

此照片攝自黃遵憲香港故居。底下文字為故居行政管理者自行添加。

梁啟超與瓜分圖名稱的聯結，主要來自他1898年著成的〈瓜分危言〉一文。這篇文章有相當的影響力，促使「瓜分」這隱喻流行於當時文人圈內。⁴⁴

意外地，在現已改為文化保存地點的黃遵憲故居，那張掛在牆上的畫仍存在（圖四）：⁴⁵

這張圖畫，以謝纘泰和之後出現的版本為基礎，又進行了創作。左邊，寫有謝纘泰版本的長詩；右邊，是稍後彩色版本上的警語「不言而喻」；底下，仍畫著旁觀小國，使用稍晚才出現的較短的名稱（從〈時局全圖〉到〈時局圖〉）。同時這圖呈現出自己與前面兩個版本不同的視角與重心。所有的文字解釋部分均被刪去，觀者需要自行思考解圖，例如，在獅子前面的蛇是什麼？然而，最重要的是，這張圖對動物的改動。熊、青蛙、老鷹在圖像上仍與前面的版本相近，但日本已變成一顆閃耀的太陽，對中國沒有明顯圖謀；鬥牛犬，或是老虎（英國），和清朝官員也不再出現在圖中央。左上角那一塊現代表歐洲的土地，是老虎現在的所在地，因為中央已被一隻中國睡獅給佔據了，酣樂到沒有察覺四周的威脅正逼近牠的領域。

從這張照片可以認出，這圖應該是某位對前兩個版本都很熟悉的繪者，以水彩繪製而成的。如果這正是黃遵憲於1900年兩次在詩中所提到那張圖，而第一版〈時局全圖〉出版日期為1899年7月，那麼此圖應完成於1899年7月之後，1900年底之前。再者，這兩首詩完全沒有提及庚子拳亂與外國勢力介入，或許表示最遲在1900年年中，這圖已經出現。最後，在黃家懸掛的〈時局圖〉，是以附有廣東語解說版本為基礎而繪製的，因此，我們更能確認這圖出現的時間為1899年7月到1900年年中之間。

⁴⁴ 我正著手進行關於這隱喻的研究。有些相關細節可見下文。

⁴⁵ 2010年雷諾（Douglas Reynolds）拜訪黃遵憲故居時，非常好心地詢問了這些圖像細節的問題。這圖像的照片依然展示著，但原作已被放到別處，無法親眼看到。

圖像的更動，似乎與黃遵憲個人態度和中國當時的政治環境相符。黃在日本所獲得的正面體驗，與其國在圖中所呈現的形象完全吻合。同時，在清廷持續壓制迫害康、梁同黨與支持者的現狀之下，他必須謹慎，不能公然在客廳牆上懸掛一張攻擊清廷的圖畫。作為一幅私人掛圖，這圖像表述了黃遵憲對外人勢力威脅國家的個人擔憂，同時對來客以無言的形式示意此憂。圖中所反映的中國危機，並非是潛在國力的差距——獅子無庸置疑蘊藏強大的力量——而是主動權的寫實。戒慎恐懼地，這圖避免提供任何特定的，關於行動上的建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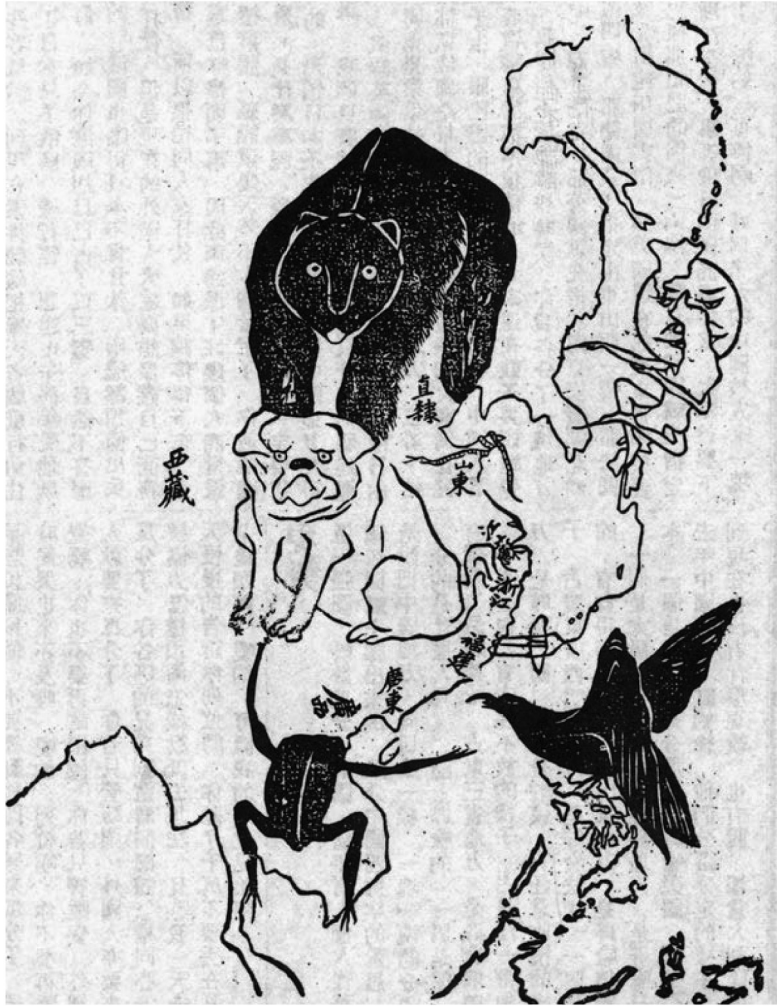
沉睡的獅子，暗示中國有追上甚至凌駕其他強國的潛力。作為一頭雄獅，但在沉睡狀態中，中國便無法將其潛力轉化為實際主動權。黃遵憲的圖像，除保有其他版本中引發觀者自慚而投身建國事業的策略外，對於潛在有雄獅般的有機統合與力量的中國，有著更高的期許。這「睡獅」形象，明顯與中國的象徵等議題有密切關係，這將在以下篇幅中討論。

第二個版本的第三種改動版出現在《俄事警聞》第一期。（圖五）⁴⁶ 此圖沒有中英文文本，然而卻附了長達兩頁的解釋文。此報創刊於1903年12月，正是在中國東北領土上發生日俄戰爭之時。在第一期〈本社廣告〉中便闡明其辦報意圖，「在於喚起國民使共注意於抵制此事之策」，即俄國侵佔中國東北一事。⁴⁷

同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樣，此報的經營者蔡元培屬於第一代的改革者，受過完整的傳統舊式教育，之後在任職之時才開始發展研究西方和日本新事物的興趣。1898年，蔡元培曾任職翰林書院，因此有機會接觸西方著作的中文翻譯，這促使他在1903年創立並參與了各種革命組織。此外，1907年他前往歐洲，在德國萊比錫學習心理學與藝術史。蔡元培的刊物是中文媒體裡，使用西方政治漫畫的先驅。

⁴⁶ 〈現勢〉，《俄事警聞》第1號（1903年12月），頁7-9。

⁴⁷ 〈本社廣告〉，《俄事警聞》第1號（1903年12月），頁2。



圖五：〈瓜分中國圖〉⁴⁸

⁴⁸ 此名稱未附在圖上，而來自與此圖一同刊出，名為〈現勢〉的說明文章。

在圖像之前，這報紙刊登了首篇社論〈普告國民〉。文章是這樣開始的：

嗚呼！國亡矣！國亡矣！我同胞猶酣睡而不覺耶？⁴⁹

第一個版本所提到的「國民」（或是「國家」），再次以「同胞」的名義在這裡出現，其中還包括那些海外的中國人。這裡所描述的當前急難來自於俄國，並非所有列強。英國恢復成鬥牛犬，雖凶狠地瞪著觀者，但以靜坐並不行動的方式來維持現狀；日本的日光不再擴散至衰亡中的滿州官員，轉而藉由臺灣對中國本土的福建省施加影響。德國已發展成一尾名副其實的小蛇，盤踞著從山東內地沿岸往南到上海的地域。

這篇名為〈現勢〉的圖像詳評，一步步為那些沒有能力解譯的（以及被激烈抨擊不及六歲小孩愛國的）預期讀者進行說明。列強與俄國之間的複雜關係困惑了中國領導群；而這領導群同時又畏懼大眾的反應，假使他們叛變的話。這造成了「我們的百姓也是和管事的一樣糊塗」，並確定了這報紙存在的需要，那便是——喚醒大眾與領導群。這報紙企圖喚醒「同胞」與「國民」奮力抵抗的是，中國政府以屈服俄人索求為方式來滿足俄人的熱切態度。

雖然這份報紙在中國媒體的首要之都上海出版（在這裡，讀者應熟悉這種類型的溝通方式，並且如前提及，還可去外國書店購得彩色海報），但從這篇評論與其簡單的遣詞用字可以看出這份報紙基本上仍試圖觸及並動員「國人全體」，就是說上海以外的，沒有雙語背景

⁴⁹ 〈社說：普告國民〉，《俄事警聞》第1號（1903年12月），頁3-4。

的民眾。⁵⁰ 這份報紙嘗試面向「國人全體」的認真態度，⁵¹ 顯示出跨越像上海這種高度發達的城市，與全國其他地方之間懸殊的困難。因此，我們必須討論這公共領域的非同質性、外國租界與中國內地的接觸地帶間的顯著失衡，以及公共領域與「國家的」領土關係。⁵²

結合了逼迫的威脅——列強瓜分，中國沉睡的問題——與行動的籲求，這張圖和附錄文字與前版關心的議題與宗旨吻合。不過，這篇評論有其特別之處：第一，它一心一意專注於俄國併吞中國東三省一事；第二，為阻擾俄國圖謀，它設計了一個相當關鍵的策略：培養大眾力量，以抵制政府把國家領土出賣給俄國的政策。

對〈時局圖〉的初步研究，已可看出抽象文字不是唯一，也不是最有效率的溝通方式。隱喻和圖像，絕非只是為給較廣泛的觀者介紹抽象事物與概念的「服務」工具。它們為達到明確的理解和合理化的行爲，提供了一條真正的途徑；同時也提供了一個平臺，專給聚焦清楚且具爭議性的討論使用。

觀念需要隱喻與明喻以求與別的觀念進行統合，而使之具體化到足以提示某種行動與方向。若想讓複雜的設想與方案變得明確，隱喻與明喻則迫切需要圖像這一環。如我們所見，他們甚至成爲寓言敘事中的必要條件，藉由小說形式，詳盡說明目前佈滿暗喻的敘述表演中

⁵⁰ 此報在第1號中宣稱，將針對不同主題與讀者群而相應採用地方方言或官話來撰文。報紙以文言與白話爲基礎，針對如「外務部」、「各省疆臣」、「領兵大員」、「駐各國公使」、「駐俄國公使」，以及「科舉家」、「各省紳董」、「鄉塾師」等的文章將以文言撰寫；針對如「南洋及美國商人」、「日本商人」、「拒俄會會員」，以及「無業游民」、「娼優乞丐」等則用白話文。針對「東三省居民」則用官話，針對「北京人」則用京話，針對「湖南人」則用湖南白話等等。見佚名：〈對俄同志會廣告〉，《俄事警聞》第1號（1903年12月），頁2。

⁵¹ 〈對俄同志會廣告〉，《俄事警聞》第1號（1903年12月），頁2。

⁵² 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 1929-）與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1936）兩位學者在他們對公共空間的研究中，忽視了一個像上海這樣的城市與內地的天壤之別，以及這些高度發達的城市之間跨國境的密切關係。對此議題的討論，請見下文。

的內在意含。如此敘事也可以反過來被描繪，或被他種媒體所評論。然而，圖像無法不釋自明，因而招致富含觀念和隱喻的文本來替它們解釋，或是某個口頭的雙關語，經由語言這媒介，突顯種種燃眉議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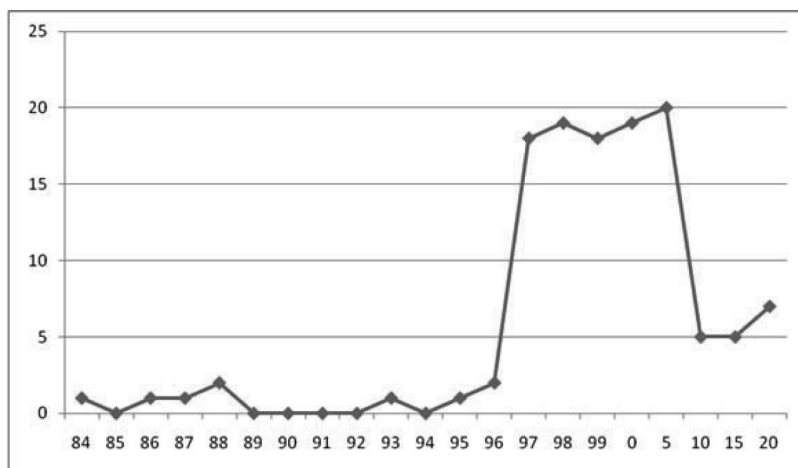
三、「沉睡」之國：隱喻與圖像的跨文化考掘

在〈時局圖〉呈現出豐富多層的觀念、文字、隱喻、圖像和場景中，我將挑選「沉睡的中國」這個主題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如此選擇，是爲了要作更經濟與詳盡的分析。

若說國家、階級或是性別等集體能「沉睡」，這預設前提必定包含著一個劇烈的週轉，或說轉變，使這個集體轉化爲一個生命實體，擁有潛在的統一意志，而這意志，在沉睡期間是無法實際運作的。這裡，沉睡這隱喻描繪出一種主動權的不對等，這可反映在同一機體的睡與醒兩狀態之間，或是兩個不同機體一個在沉睡，另一個已醒來之狀態間。

「沉睡」作爲隱喻，自1880年後，在中文中遍及使用。下圖，是基於藏有豐富改革相關文獻的「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搜索結果而繪製。⁵³此圖說明「沉睡」這隱喻從1884至1920年間的使用率。

⁵³ 非常感謝金觀濤與劉青峰教授的支持，使筆者有機會利用其「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研究開發，劉青峰主編）。該數據庫目前正由政治大學與香港中文大學共同繼續研發完善，檢索服務由政治大學「中國近現代思想及文學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計畫辦公室提供。同時也感謝鄭文惠教授的介紹，並請她的助理張靖怡協助筆者擷取這份數據資料。



圖六：「沉睡」隱喻從1884至1920年間的使用率⁵⁴

就我所能找到的資料範圍裡，中文使用沉睡這隱喻，最早出現在1884年中法越南戰爭的紀錄裡。這記錄是由不同作者合力而成，其中包括此紀錄的編輯者日人曾根嘯雲（1848-1910），並在中文文本中添加了日文閱讀記號；負責選擇摘錄的香港《循環日報》編輯王韜（1828-1897）；而越南人阮合廷（音譯，原文作 Ruan Heting），則負責校對最後結果。此紀錄裡有這樣一段話：

前者西人之侵清國，適值清國官員睡在夢中，而清人又未悉清人伎倆。今清官既已夢醒，又預備二十餘年，含憤已甚，接切齒而仇法。⁵⁵

⁵⁴ 由「沉睡」這隱喻從1884至1920年間的使用率可看出，自1884至1920年間的中文文章，使用「沉／睡」隱喻來形容國家或人民——多用於中國——的情形。圖表數字基於「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注意：1884年之前沒有任何相符資料；1884到1900年間每年皆有數據，1900年後每5年有一個數據。）

⁵⁵ 曾根嘯雲、王韜等人編：《法越交兵記》（原於1886年初版），收於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第165卷，第4章，頁439。

以上圖表的上下曲線，描繪了一開始只是偶爾提及「睡」，到1896年後出現次數急遽上升，而出現的範圍卻只是在非常有限的出版品裡，而且幾乎全與改革派有關，如康有為、嚴復、梁啟超與譚嗣同。⁵⁶當時主要報紙《申報》，雖未收錄在此數據庫中，但基於1872年到1893年的電子數位全文版的顯示，大約在1887年，以沉睡來隱喻中國的文章有，但非常有限，之後直至1893年，便再也沒有此隱喻的出現。簡略檢視其他十九世紀末與改革有關的中文論著，更可以進一步確定沉睡這隱喻，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僅流傳於前述作者群的小圈子內，而其之所以產生影響力，主要是因為他們出版了大量的報紙與雜誌。直至1900年之後，沉睡隱喻才擴及到更多樣的出版物中。⁵⁷

簡言之，這隱喻先是被一小群的中國改革分子所共有與散播，僅僅使用在他們具有影響力的論著作品裡。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以及1898年由清廷推動的百日維新，使沉睡隱喻的使用頻率到達高峰。然而就圖像而言，直到1900年後，在種種對沉睡中國與此主題的多樣呈現與描繪不再那麼令人費解之時，這隱喻才開始以漫畫圖像的形式刊登在中文白話報紙上。⁵⁸

或許，有人會認為隱喻的散播是通過匿名且集體的過程。然而，發展隱喻所需的創造性和反直觀性，常指向一些具體個人的努力。他們或許是在擁有廣泛讀者和被廣泛使用的文本中創造了其隱喻，或許是在不同的文化語境中，協助介紹某個隱喻給讀者。有鑑於沉睡隱喻在一定時間範圍內的失衡使用，而且限於同一類的中文期刊，這說明上述作者群在這隱喻的推廣與普及上，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

然而，進一步檢閱這些文本，我們才發現他們對於沉睡隱喻的運用實際上是復甦了對此在中國更早的討論。1897年之前，唐才常

⁵⁶ 《時務報》、《知新報》、《清議報》、《國聞報》、《湘學報》、《萬國公報》和康有為、何啟與唐才常的選輯論文。

⁵⁷ 至2011年3月，還無法在《申報》數據庫取得1893年到1937年間的資料。

⁵⁸ 後續的篇章中，將會提供此文獻資料。

（1867-1900）等作者曾以明確且指責的口吻，提到一篇由中國當時駐倫敦、巴黎、聖彼德堡大使曾紀澤（1839-1890）於1887年所撰，名為〈中國：睡與醒〉（“China: 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之文章。此文由英文寫成，出版於1887年1月的倫敦《亞洲評論季刊》。1897年到1910年間，許多使用沉睡來形容中國的文章都提及此來源。他們雖然同意曾紀澤說的：「中國曾沉睡。」卻反對曾紀澤接下來聲稱的：「中國終於醒來了！」曾作此論是因為1870年至1880年之間中國海防上的發展，使其認為這足以使中國有能力捍衛自己、甚至行使對朝貢國的權利；同時在不受外國勢力干擾之下，也建立了內部蓬勃發展的條件。但是甲午戰爭的慘敗，導致了後來人們對此定論的否定。

至此，種種意外與不規則現象已然堆積到使我們不得不認真反思我們研究方法的可行度。曾紀澤的英文文章提示給我們一個相當簡單的事實，這裡所分析的整個過程，即是有其特殊動能的跨文化交流的一部分。（待續）

（校譯：蔡祝青；責任編輯：詹筌亦）

徵引書目

- 〈現勢〉，《俄事警聞》第1號，1903年12月，收於《中華民國史料叢刊》重印版A12，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83年，頁7-9。
- 〈本社廣告〉，《俄事警聞》第1號，1903年12月，頁2。
- 〈社說：普告國民〉，《俄事警聞》第1號，1903年12月，頁3-4。
- 〈時局圖題詞〉，《近代史資料》1954年第1期，頁6-12。
- 〈對俄同志會廣告〉，《俄事警聞》第1號，1903年12月，頁2。
- 王云虹：〈有關《時局圖》的幾個問題〉，《歷史教學》2005年第9期，頁74。
- 石川禎浩：〈晚清「睡獅」形象探源〉，《中山大學學報》2009年第5期，頁49、88-96。
- 朱熹撰，黎靜德、佐藤仁編輯：《朱子語類》，京都：中文出版社，1984年。
- 單正平：〈近代思想文化語境中的醒獅形象〉，《南京大學學報》2006年第4期，頁29-36。
- 單正平：《晚清民族主義與文學轉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 曾根嘯雲、王韜等人編：《法越交兵記》，原於1886年初版，收於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第165卷，第4章。
- 黃遵憲：《日本國志》，羊城：富文齋刊本，1890年。
- 黃遵憲編，錢仲聯箋注：《人境廬詩草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 楊瑞松：〈睡獅將興？近代中國國族共同體論述中的「睡」與「獅」〉，《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0期，2008年11月，頁87-118。

- 謝纘泰：“The Chinese Republic: Secret History of the Revolution”，《南華早報》，1924年，頁9。
- Appleton's Annual Cyclopedia and Register of Important Event of the Year 1900*. New York: D. Appleton and Co. 1901.
- Black, Max. *Models and Metaphors.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2.
- Blumenberg, Hans. “Ausblick auf eine Theorie der Unbegreiflichkeit.” in *Schiffbruch mit Zuschauer. Paradigma einer Daseinsmetapher*. Frankfurt: Suhrkamp, 1979.
- Blumenberg, Hans. “Das Verhältnis der Metaphorologie zur Begriffsgeschichte (im engeren terminologischen Sinne) als ein solches der Dienstbarkeit.” in *Paradigmen zu einer Metaphorologie*. Frankfurt: Suhrkamp Publishers, 1998.
- Blumenberg, Hans. *Paradigmen zu einer Metaphorologie*. Frankfurt: Suhrkamp Publishers, 1998.
- Boulger, Demetrius. “The Sick Man of the far East.” *The New Century Review* 10 (1897): 258.
- Brunner, Otto, Werner Conze, and Reinhart Koselleck, eds.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 Stuttgart: E. Klett, 1972-1997.
- Cohen, Paul. “Wang Tao and Incipient Chinese Nationalism.”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6, no 4 (1967): 559-574.
- Demandt, Alexander. *Metaphern für Geschichte. Sprachbilder und Gleichnisse im historisch-politischen Denken*. Munich: Beck, 1978.
- Edgerton-Tarpley, Kathryn. *Tears from Iron: Cultural Responses to Famine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8.
- Fitzgerald, John: “‘Lands of the East Awake!’ Christian Motifs in Early

- Chinese Nationalism)》，收於黃克武、張哲嘉編：《公與私：近代中國個體與群體之重建》，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年，頁362-410。
- Goldfuss, Gabriele. *Vers un Bouddhisme du XXe siècle: Yang Wenhui (1837-1911), réformateur laïque et imprimeur*. Paris: De Boccard, 2001.
- Kiong, Wong Sin, and Jeffrey N. Wasserstrom. “Animal Imagery and Political Conflict in Modern China”，收於勞悅強、沈安德（James St. Andre）編：《漢學縱橫》，香港：香港商務印書館，2002年，頁233-275。
- Konrad, Hedwig. *Étude sur la Métaphore*. Paris: Librairie Philosophique J. Vrin, 1958.
- Lakoff, George, and Mark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Linhart, Sepp. “Niedliche Japaner” oder “Gelbe Gefahr”?. Vienna: Lit Verlag, 2005.
- Link, Jürgen. *Die Struktur des Symbols in der Sprache des Journalismus. Zum Verhältnis literarischer und pragmatischer Symbole*. Munich: Fink, 1978.
- Mendell, C. W.. “Horace I. 1.” *Classical Philology* 33, no. 2 (April 1938): 147.
- Noriko, Kamichi. *Reform in China: Huang Tsun-Hsien and the Japanese Model*. Cambridge, MA: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1981.
- Peil, Dietmar. *Untersuchungen zur Staats- und Herrschaftsmetaphorik in literarischen Zeugnissen von der Antike bis zur Gegenwart*. Munich: Fink, 1983.
- Plato. *Republic*. trans. Benjamin Jowet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71.
- Quaritsch, Helmut. “Das Schiff als Gleichnis.” in *Recht über See. Festschrift Rolf Stödter zum 70. Geburtstag*, edited by Hans Peter

Ipsen and Karl-Hartmann Necker. Hamburg: R. v. Decker's Verlag, 1997.

Wagner, Rudolf G.. "The Canonization of May Fourth." in *The Appropri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China's May Fourth Project*, edited by Milena Doleželová-Velingerová , 66-122. Cambridge: Harvard East Asia Center, 2002.